

社会学
论丛

丛书主编 周晓虹

第 3 辑



大过渡时代的 中国青年

主编 周晓虹 周 怡
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7-305-03511-4



9 787305 035111 >

ISBN 7-305-03511-4/C • 86

定价:25.00元

大过渡时代的中国青年

主 编 周晓虹 周 怡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过渡时代的中国青年/周晓虹,周怡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ISBN 7-305-03511-4

I. 大... II. ①周... ②周... III. 青年-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D43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044 号

丛 书 名 社会学论丛
书 名 大过渡时代的中国青年
主 编 周晓虹 周 怡
责任编辑 徐 滨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郭 枫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印张 15.375 字数 393 千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 价 25.00 元
ISBN 7-305-03511-4/C·86

声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 3592317、3593695、3596923

时代的聚焦：青年问题与青年研究(代序)

周晓虹*

在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最令人感到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莫过于青年问题,与此相应最富挑战的课题则莫过于青年研究。说青年问题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家必须直面的现象,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正式进入社会的准备期的不断延长,不仅青年的数量在社会群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同社会、同社会中的主流群体——成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并且,这一现实因近几十年来越来越迅猛的社会变迁变得更加突显。社会变迁一方面使得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年长者的经验越来越少地具有传承的价值,另一方面却使得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年轻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诠释生活的“话语权力”。在这样的不平衡态势下,要避免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社会科学家就应该和整个社会一起,为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的同舟共济找到一条理性且负责任的途径。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现在,更关系到

*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暨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210093),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

我们的未来。而这正是与此相关的青年研究或青年社会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能够构成青年研究的话题不胜枚举。在这篇代序中,我们只想用最经济的篇幅,论及这样几个问题:其中包括青年问题何以能够引起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中国的青年问题和青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后,一如先前的两本文集一样,我们也要述及本文集的编撰动因及收录其中的研究论文。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我们能够感到,青年问题或青年研究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都像我们这篇代序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时代的最富穿透力的聚焦。

传统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年”这个概念。或者起码说,在传统社会,不仅“青年”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极低,而且其内涵和外延同今天也有着极大的不同。

据考证,在西方历史上,“青年”一词最早出现在距今 2 800 多年的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在《奥德赛》第八卷中,提到“青年”一词的地方有许多,诸如:“你须速拣取如飞快艇,将它放入海中进,并挑选青年五十二,都须是行船素负大声名”,以及“有许多英雄青年,已等着要显他们的本领。”^[1]但是,有些学者怀疑,这样的用法是否是由于汉译者付东华先生的意译所致。^[2]因为在其他西方文献中,“青年”一词的比较频繁的使用始于工业革命之后。

中国的文献典籍也能够对这种说法提出佐证。无论在较早的《诗经》或是在其后的《论语》以及各代名家的诗词歌赋中,常用的都是“后生”、“郎”、“君”、“少”、“小生”、“女”、“淑女”等词,却极少见到“青年”的说法。在传统社会对年龄的划分中,孔夫子在《论语·季氏》里的一段论述很有代表性:“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

得。”这里提到了少年,壮年,老年,却唯独没有提到青年。这种对“青年”或这一概念的忽视并不是一种个人好恶或者兴趣使然,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人们的成长历程决定的。在传统社会里,不仅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缓慢,谋生的技能十分单一、粗陋,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极其简单。家庭无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还是作为一个社会细胞,都足以在其间给予子女以基本的谋生训练。因此,孩子从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独立谋生,既不需要严格的就业前的训练,也不需要单独地了解 and 适应社会。成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其自然而快速的过程,因此在他们的生命周期中,是不存在“青年”这样一个既独立又依附的过渡时期的。与此相应,社会结构中也没有“青年”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存在。

创造了“青年”这一群体的最根本的力量,是 17 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浪潮。这些新兴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一方面,冲击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导致了新兴势力的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则对进入社会、进入大工业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换言之,新思想的出现和青年进入社会所需要的准备,不仅使这一群体被正式划分了出来,而且也使其相关的一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被提出。在歌德的少年维特和卢梭的爱弥尔身上,我们都已经能够看到年轻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与世抗争的热情和勇气。1762 年,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写道:“他对我向他说的话以前是乖乖地服从的,而现在则充耳不闻了;他成了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不相信他的向导,他再也不愿受人管束了。”^[3]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出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父子或代际的对立与冲突,青年的苦闷、彷徨、标新立异或离经叛道开始成为文学作品或人们的口头论争的主要母题之一。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青年推向了社会生活的风口浪尖,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对象。进入 20 世纪,首先是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以两卷本的《青春期:它的心理学及与生理学、

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敲开了青年研究的大门。^[4]他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流传甚广的“青春期危机”理论。他认为,青春期的困惑是由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的特定心理反应,因此,它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无法回避的调适阶段”。尽管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生物决定论的色彩,但它却是青年研究进入学科化阶段的公认标志。

其实,与霍尔同时甚至要早于霍尔,西方国家的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涉足青年研究这一全新领域。1900年,瑞典学者埃伦·凯伊(Ellen Key)先于霍尔,写出了《儿童的世纪》(又译《儿童与青年》)一书。这本与世纪同行的著作以青少年问题为主题,其中涉及儿童的劳动与福利,青少年的义务教育,妇女、儿童和青年的公民权利,青少年保护的立法,以及现代亲子关系等。凯伊的影响使得人们相信,正是她和霍尔一起将威廉·冯特的普通心理学同儿童与青年研究卓有成效地联系了起来。^[5]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促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的同时,使得青年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欧洲大陆出现了青少年的不良化倾向和新旧两个时代的剧烈冲突,以及青年的失业问题。面对这种现象,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围绕青春期和青年问题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始了他们的探讨。心理学家奥托·图姆利茨(Otto Tumlirz)、C. 彪勒(Charlott Buhler)和E. 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20年代相继出版了他们各自的青年心理学,对青年心理的特征、青春期的生理基础作了相当细致的论述,斯普兰格甚至将青春期形象地比喻为“第二次诞生”。

和心理学家不同,社会学家选择了自己的角度来关照青年和青年问题。1928年,德国社会学家K. 曼海姆继承孔德、狄尔泰和芒特雷等人的观点,在《世代问题》一文中,将社会变迁的概念引入代际关系和青年研究。他认为,社会变迁的进程取决于新的年龄群体的连续不断的出现,取决于这些群体同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的

“新接触”。^[6]价值观、社会行为准则通过代际更替而变化,通过新成员的不断进入和旧成员的不断消失而变化。这两种因素保证了社会生活的“年轻化”以及文化传递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和迅猛的发展时期,短暂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包括代际冲突在内的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但是,好景不长。1963年,肯尼迪的被刺使得人们对原本绚丽多彩的“美国梦”发生了怀疑,不久之后的“越战”更是导致了人们尤其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失意和彷徨。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倾斜,黑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最具冲击力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校园里的学生在酝酿同政府的大对抗的同时,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牛仔裤、避孕药丸、霹雳舞、摇滚乐、披头士长发、铆钉裤、同居公社乃至同性恋群体、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这些五花八门的“新东西”层出不穷,而每一件都与青年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这时的人们正如“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都想要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7]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以1968年的“五月学潮”和1969年“伍德斯托克事件”为代表的欧美青年大造反运动的出现自然不可避免。

青年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甚至成为问题本身的同时,青年研究也重新独领风骚。1970年,作为对前述欧美青年运动的回响,美国出版了两部极为畅销的代沟研究专著:其一是文化人类学家M. 米德的《文化与承诺》;其二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赖克的《美国的返青》。

《文化与承诺》和《美国的返青》这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有许多十分酷似的地方:

1. 两书的作者都认为代沟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伴随物:赖克深信年轻一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和他们的祖辈(第一意识)与父辈(第二意识)完全不同的“第三意识”;而米德则明确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

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8]

2. 两书作者都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赖克宣称年长的一代应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若干年的重新学习、重新接受再教育”；^[9]而米德则指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社会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孕育了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后喻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递方式，即由年轻一代将他们对不断变动中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和不断涌现出的新知识，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

70年代是青年的时代，其时，青年及其青年问题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也在此时设立了许多全国性的青年研究和协调机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1年波兰学者阿达姆斯基(V. Adamski)率先提出了建立一个综合的青年学科的呼吁。紧接着阿达姆斯基，保加利亚学者高斯波迪诺夫(K. Gospodinov)提出，应该在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独立的青年学；波兰学者内米尔科则认为，“青年学是研究青年人如何实现成熟期前的准备任务的科学。”^[10]在这一系列的努力影响下，1983年，罗马尼亚学者马赫列尔(F. Mahler)出版了青年社会学的著作——《青年问题与青年学》。在这部著作中，马赫列尔提出目的性取向和社会—时间的两重性是青年的两个最本质的规定性。他强调“青年是以未来大于过去的时间领域的不对称关系为特点的年龄。”^[11]这部著作不仅全面地阐释了青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中期它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直接促进了中国青年研究的成长。

来自东西方的共同努力，使得青年问题和青年研究到70年代末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1980年，来自美国、苏联、意大利、阿根廷等11国的青年研究专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届大会提出了题为《八十年代青年的动向》的综合报告。报告郑重提出：“青年作为相对整齐的社会群体，其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是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变化分

不开的。”^[12]至此，青年问题和青年研究不但进入了大学的教科书、研讨会、会议文集，而且进入了各国政府的发展计划、政策制定的议程之中。

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研究也理应成为我们前述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是没有“青年”这一概念的。甚至到20年代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建立的青年组织也还没有使用“青年”的概念。而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而青年与少年事实上的分离也确实是近代以来的事。

如果说欧洲“青年”的出现同工业革命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的话，那么，在中国“青年”的出现则是新式教育的直接产儿。中国的新式教育始于19世纪中叶，是随同“洋务运动”而起的新潮流之一。在此之后，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主张以西方的“新学”来改良传统的“旧学”，他们继续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校以传播新思想、培养各类维新人才。到了民国初年，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达几百万的青年学生群体。^[13]只是在这时，“青年”才正式出现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舞台上。但是，从中国青年出现的那天起，它就担当起了救国图存、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始于“五四”运动。我们可以将从那以后的整个青年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这就是：① 开端时期；② 深化时期；③ 发展和挫折时期；④ 重建和繁荣时期。^[14]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入手，反观中国的青年运动和青年问题。从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青年研究向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焦点与汇聚。

第一个阶段“开端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步而生，其时的研究特点是从民主和科学的角度唤醒青年，而其标志则是1915

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诞生。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二、三号上,发表了高一涵的《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一文,对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青年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实,此后发表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才称得上是狂飙突进的政治檄文。陈独秀宣称,他办杂志的目的就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而李大钊则呼吁青年们行动起来,创造“青春中华”。他们对新文化的倡导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毛泽东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时也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5]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时间“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青年社团,《湘江评论》、《新潮》等青年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蜂拥迭出,它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五四”运动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青年的觉醒。这场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创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深化时期。这一时期一直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相伴而随,它的具体走向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政治性的,研究的主题是青年如何投身社会革命运动,代表作是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恽代英的《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等。在这些文献的引导下,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在随后30年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经历了“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五·二〇运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第二个方面是学科性的,1925年杨贤江出版了《青年问题》一书,1933年沈履则出版了《青年期心理学》一书,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青

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的开端。

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是发展和挫折时期，自 1949 年到 1978 年。在这整整 30 年中，中国青年和青年研究的遭际一言难尽。一方面，新中国的诞生在激发起青年一代的热情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的机会。党和党的领袖在各种场合将青年比喻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鼓励他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1949 年后，全国有 25 万青年学生进入各类干部学校，他们在短暂的学习后，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中去；自 1955 年起，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年就有 20 余万青年参加了垦荒队……，一时间《军队的女儿》、《年轻的一代》中的主人公成了千百万青年的精神偶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自 1957 年开始，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有时成了不信任、怀疑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对青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始于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达到高峰，几千万城镇青年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此相应，整个中国的青年研究也失去了应有的生气，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的一种简单注释。

1978 年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空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自 1978 年起青年研究进入第四个阶段——重建和繁荣时期。这 20 年来的发展由前后相继的两个 10 年构成：第一个 10 年是重建的 10 年，其标志是名目繁多的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蜂拥而出；而第二个 10 年才是真正繁荣的 10 年，从这时起许许多多的青年研究者开始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完成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实证研究，将中国青年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仔细回想起来，80 年代的青年研究热潮同当时发生的一个个事件多多少少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1980 年，化名“潘晓”的一位

青年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短短一个月内，《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了讨论稿件 2.5 万多件。“讨论中最值得深思的倒不是青年最终在确定某种新的人生价值准则方面达成了认同，而是他们毫不保留的抛弃了前数十年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系列人生价值准则。”^[16]这场讨论的结果是两方面的：其一，随着讨论的开展，社会科学家们在来自内部的需求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学术交流的双重影响下，开始了对青年研究的大规模的探索。1980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青少年研究所”，随后，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浙江等地也相继建立了青少年研究机构。在那些年里，不断有新的青年研究的学术杂志、学术研讨会出现。人们还以青年大学生、青年工人、失足青年为对象，完成了一系列虽较肤浅但颇具新意的专题研究。《青年心理学》、《青年美学》、《青年社会学》、《青年人才学》……等林林总总的青年学科也以极快的速度“繁殖”出来。其二，在“价值观大讨论”的直接影响下，紧接着还引发了电影《沙鸥》的讨论（1981 年）、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中的麦克唐纳是否等于雷锋精神的讨论（1982 年）、张海迪的生活是否幸福的讨论（1983 年）、因电影《人生》而起的“人生”的讨论（1984 年），以及长江漂流队员的冒险精神的讨论（1986 年）。同前述学科热中的研究著述相比，这些讨论倒因为带有更多的生活原色而显得生机勃勃。

90 年代的中国青年研究是值得给予更多关注的。其实，深入的具有一定学理性质的研究在 80 年代末已开始出现。1988 年，张永杰和程远忠出版了他们名闻一时的代际社会学著作——《第四代人》。两位作者根据 M. 米德关于“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观点，以建国——文革——改革开放为三大标志，将当今中国社会的人群分为四代人。作者强调指出，中国社会在从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代沟”问题已经日益明显、普遍，代沟已经从家庭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这种几代人共世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几代人之间的冲突在今天乃至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17]也是在这一年,周晓虹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率先提出了“文化反哺”一词。他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18]尽管“文化反哺”在1988年的中国尚处于萌生的状态,但此后1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使之成为一种文化传递的崭新模式。

谈及90年代的中国青年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及陆建华的《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这篇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是当时青年研究领域中的难得一见的力作,在理论研究的深入性、规范性和学术性上开创新鲜风气。该文认为,青年问题存在本身就体现了对既存社会制度的疑问和挑战;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回答疑问、接受挑战,能否消解青年问题的消极后果,使青年的合理社会行为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全面的制度化保证。作者分析了青年问题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即典型的制度问题、隐性制度问题和反制度性问题。基此,作者认为,80年代青年的许多行为以及青年问题都具有系统的、强有力的制度背景。首先,青年问题的出现是与旧体制的弊端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制度改革目标、措施、实际社会后果之间的严重脱节对青年问题起了激化的作用;再次,制度改革的曲折则使青年问题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虽然当时文章受到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有严重错误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19]他们从方法论上批评了陆建华的观点,认为不能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从人类共同体的实际社会存在中抽象出来,特别是不能从社会的阶级状况中抽象出来;年龄上的划分,不能反映青年的本质特征,应当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代沟的概括,是一个肤浅的或者是盲目的判断;……究其实,制度一词的不同内涵及其学术界定,是产生歧义、误解、偏见的重要原因。但是,陆建华的文章也赢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邵道生撰文进行

反批评,肯定把握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所具有的重要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他认为,陆建华的《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超越了对于事实的简单枚举、浮光掠影的描述,不是单调机械的空洞赞歌,也不是喋喋不休的老生常谈,而是对青年与社会—历史互动进行的真切的、清醒的、深层次的观照。^[20]

总体上看,1990年至今,中国青年研究的走向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发展特征:

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青年群体对这一空前机遇与挑战的回应日显瞩目,有关青年生存状态变异及其观念嬗变的研究成为青年研究的现实热点;

2. 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众多的研究者以敏锐的目光关注大过渡时代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奋斗与挣扎,研究议题涵盖广泛,主要涉及:青年的社会特质(青年的社会特性、青年文化、青年发展)、青年的价值观念的变迁、青年社会行为的变化(社会流动、犯罪、性、闲暇及消费行为)以及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代际关系、家庭结构和教育)等。

3. 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和壮大,中国青年研究日趋制度化,学科研究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得到了空前良好的发育和健康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将青年研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用规范化的研究手段开展了青年问题研究的学科探索。

90年代开始,许多涉及中国青年实态与发展的论著和报告纷纷付梓面市,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杨雄,1992年)、《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1993年)、《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周怡,1994年),以及最近出版的《向孩子学习》(孙云晓、康丽颖主编,1999年)等。

杨雄的《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是一部专门论述青年文化现象的学术著作。青年文化,作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学术名词,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于80年代后期形成中国学术

界热点。这部著作将青年文化的构成分为青年政治文化、审美文化、性文化、偶像文化、消费文化等几大块,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提耶夫的所谓“长波循环理论”,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方法观照了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文化大体发展线索与波动规律。作者以颇有见地的笔触指出,“当前只有重构改革的意义感,才能有效克服社会‘长波循环’的再发生。”从而表达了一位青年研究者对社会历史走势关注的使命感。^[2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自1988年~1992年承担了“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的专项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演变研究》为书名出版。^[22]该书运用科学方法对青年价值观及其取向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实、充分的实际调查,对青年价值取向的现状(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恋与性价值观)进行了真切、细腻的描述,并将之置放于不同参照体系之下(地区、文化程度、身份、年龄、性别)进行了比照、分析,得出了关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走势和前景的前瞻性结论,进而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周怡有关代沟现象的系列论文也是90年代中国青年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从1993年起,她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包括《代沟与代差:形象比喻与性质界定》(1993年)、《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1994年)、《代沟理论:跨越代际对立的尝试》(1995年),以及《当代中国乡村的“代文化”》(1996年)等。在这些文章中,她提出了“拥有性代沟”和“观念性代沟”的差异,并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前一种形式的代沟已经十分明显,但后一种形式的代沟尚不明显,这导致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代沟现象十分普遍但“代意识”却比较缺乏的局面。^[23]

我们最后有必要提及的《向孩子学习》一书,严格说不属于青年研究的领域,但是不仅它关注的对象,少年和青年有着最为直接的前后相继性,而且它所涉及的主题——反向社会化或“文化反